

刘伯红访谈录

问：请讲将你个人成长的经历以及自己从事研究的一些理念是怎样形成的？个人经历是怎样影响你从事妇女研究的？

答：好。先说说我个人的成长背景。我和共和国的发展有同样的经历，咱们是 1949 年建国，我是 1951 年出生。我生长在一个军人的家庭，小时候是在部队的保育院度过的，然后进了部队的幼儿园，幼儿园后，就进了部队的子弟小学。成长的环境是集体的生活，是革命的大家庭。我们幼儿园好多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是当时的志愿军，他们都不在孩子们的身边，我们在幼儿园里，就像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

小时候这种经历，现在回想起来，给我很多的教益。我弟弟有个小孩，我弟弟和他妻子长期在国外工作，他的孩子埋怨他的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不负责，你们生了我为什么不养育我？”当时在 70,80 年代中国的外交官或驻外人员是不能带孩子出去的。我就跟这个小孩子交流思想，我说你现在可能抱怨你的爸爸妈妈为什么生了你不养你。我现在要感激我爸爸妈妈生了我以后，不养我而把我送到了保育院、幼儿园、小学（寄宿制）和中学（寄宿制）。我们想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可能是时代和教育所赋予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在革命大熔炉里生活，我们不抱怨爸爸妈妈，因为我们崇敬他们，知道他们负有更重要的责任，与养育我们相比，他们的社会责任更重要的。同时部队又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把我们养育起来以减轻他们的家庭负担。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使我十分怀念，它给了我很多东西，至今已经融化在我的生命中。这种东西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社会责任感的東西。这个小朋友的父亲母亲可能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回不来了，我们就像兄妹一样，老师和阿姨对待这些孩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烈士子女，比对待我们有爸爸妈妈的孩子还要好，像妈妈一样，他们尊重这些烈士为共和国赴汤蹈火，牺牲流血，对他们的孩子倍加珍爱。小时候唱一支歌，歌词是“阿姨像妈妈，宝宝听你的话”，真的是那样。保育院

阿姨带我的故事，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起来。说一个特别小的故事，50年代初期是没有冰箱的，阿姨为了让我们夏天吃上特别凉的糖拌西红柿，就把西红柿切好了，拌上糖，放在盘里，搁在水桶里，拿绳子把桶吊到井下，用井下的温度冰西红柿，到吃饭的时候拿出来给我们吃，那时候觉得糖拌西红柿特别好吃。现在条件好了，凉拌西红柿可以放在冰箱里，但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还觉得那是个好吃的东西吗？40多年过去了，我每次吃到凉拌西红柿的时候就想到保育院的朱燕宗阿姨。在革命的摇篮中，小伙伴们彼此之间像兄弟姐妹一样。所以我长大以后就一直崇尚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我就挚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情景，那种目标一致的信念，团结一致的力量，亲如姐妹兄弟的情谊。我本人身上多少有一种哥们义气，愿意与朋友同甘共苦，可能源于父辈那一代，也许我牺牲了但掩护了你，我觉得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别崇高。

问：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你后来做妇女研究有什么影响？

答：对我的影响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我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曾经告诉过我他们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他们要为一个新中国而奋斗。现在我给我爸扫墓的时候常常想，如果我爸他们知道现在的干部这么腐败，他们打出的天下就是这么一个结果，他们还会为此流血牺牲吗？我问我妈妈这个问题，我妈妈说“还会”。我想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献身精神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些其实特别深刻地影响我，不会像现在的孩子一样，SARS来了比谁跑得都快。我们现在为性别平等而奋斗，其实是和那时父母亲的理想是一样的，他们那个时候是希望让穷苦人当家作主人，我们是让是很具体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够在基本人权的保障之下过体面的生活。

问：你觉得在儿时所受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熏陶，是你目前奋斗的非常重要的背

景和基础吗？

答：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一种影响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他们学习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他们在获得政权后，要建设一个国家，他们没有经验，实际上他们是克服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非常努力地学习的，这对我非常重要。我是一个没有太多学习机会的所谓有经验有学问的专家，其实，克服困难学习的办法是我跟他们学的。

问：那么请您谈谈你是怎么进入性别平等这个领域的，你在这个领域里你的所得所获。

答：我的工作经历很有意思，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妇女研究。以前我都是在主流岗位工作，比如当工人、当兵。从传统意义上说，妇联不是一个主流部门。在前辈人的时代，什么人在妇联工作呢，是那些领导干部的夫人们，她们一般没有专业能力，协助丈夫们去做妇女工作，所以小的时候实际上是看不起那些官太太的，觉得她们不是凭自己的努力，而是凭丈夫的权力和地位。我小时候的理想，根本与妇联无关。但后来为什么我自己选择了在妇联中做研究工作，实际上是有非常的多的复杂原因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是我自己做的选择。

80年代中期我在学校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思想史。86年有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背景，那之前是一个改革开放、事实求是、百废待兴那样一个火热的年代，中国有个非常大的历史转机和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突破了思想禁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性灾难，当时大家很有激情，选择了一些当时非常前卫的题目作为自己论文的选题。但是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选择的这些带有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前沿课题都被“枪毙”了。为了避嫌，大部分同学都做了历史方面的论文，我发现做妇女方面研究，虽是边缘化的课题，但是一个不被拒绝的问题。于是我当时就做了三大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男女平等思想研究。现在看，当时复杂的政治因素使我无意之中进入了男女平等的思想研究，而且对它有了浓厚的兴趣，我看到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不可以说人道主义、人性、人权，

但是说女性、妇女权益，可能有社会轻视妇女的原因，认为这不会造成政治思想领域的危险，反而给你创造了一个研究空间。我是一不留神进入这个领域的。

选择这方面的研究后，老师和同学都为我感到深深遗憾。我可能还算是学习比较好、在学校有些影响的学生，同学们给我的选择一个评论，叫做“好钢没有用到刀刃上”；还给我一个忠告：“伯红，你不要因为暂时的政治环境，而逃避体制改革研究的责任，去研究妇女问题，太可惜了！”

以后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和卜卫做了“中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我们的论文被北美华人社会学会的年会选中，有人找我谈话说，你们的研究无论定量还是定性方面都很有新意，中国还没有这样的研究。但如果你们用同样的方法和精力投入到政治和经济方面去，你想对社会将有多大的影响力，也为我们感到遗憾。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一些现在有了影响力的学者们，态度变了，用了另外一个词来评价我所做的研究，叫做“歪打正着”。他们也开始感到从性别平等这个领域切入，可以涉及到非常多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和切入点。

我们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实际上，工人的非政府组织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比如像自上而下的工会，尽管中国签订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政治和公民权利公约》，其中有结社和言论自由这样的内容。但是妇女的非政府组织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也是中国最早的非政府组织的三大力量之一，妇女的非政府组织、扶贫的非政府组织、环保的非政府组织。我自己的研究经历说明，中国实际上有一个公民社会的空间，可能不叫这个名字，也不是体制化了的东西，但是一个缝隙，也许碰巧赶到了。

在我们这个领域当中，可以研究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基本人权，包括她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受教育权利，包括身体权利。当然，不是一开始就达到那么高的起点，

但是可以慢慢涉及到，这是跟中国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婚姻家庭权利，包括不受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开始提的时候是非常敏感的，包括监狱当中女犯人的权利，都作为妇女的权利提出来了。既然妇女有这样的权利，所有公民都有这样的权利，残疾人有这样的权利，农村人有这样的权利，老年人有这样的权利，儿童也有这样的权利，其实妇女不过是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所以我的朋友也好，同学也好，现在反过来，觉得我歪打正着了。

中国的妇女研究在这些方面比主流研究早。中国的第一次非政府组织国际研讨会，当时还不敢叫非政府组织 (NGO)，叫非赢利组织(NPO)，是 1999 年 7 月在北京友谊宾馆开的。而妇女非政府组织研究的国际会议是 1999 年 6 月在牛津大学开的。一般人认为，妇女素质比较低，妇女的研究也就一般般，但是我觉得受到国际上战略眼光的影响，妇女研究不一定比主流的研究晚和浅，包括用社会性别分析公共政策。我们看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用什么样的程序，用什么样的原则，然后怎么去检验、评估和修订。人们习惯认为，一个政策对所有人的影响是一样的，政府制定政策可以代表所有的人，政府可以评定政策好或者不好。我们用社会性别分析等方法，反馈政府，告诉他们，一个政策可能对社会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影响。谁来评估政策的优劣，不应是政府 (政策制定者)，而应是政策的用户，或第三种力量 (独立评估专家)。再比如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政府也不得不接受社会性别视角，不仅仅把它看成一个中国男孩偏好的生育传统，或仅把它看成一个 B 超介入的纯技术问题。用社会性别的观点来分析，它是一个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解放这么多年了，一个传统的观念还在起作用，它的背后必定是一些物质的、制度性的东西在起作用。比如土地政策，财产政策，婚姻政策，包括农村基层选举政策，如果女孩子没有投票权，只能当别人家的媳妇，由她的丈夫来投票，没有资格当选基层社区的管理者，没有实际上的继承权、财产权，女孩入学也难，就业也难，结婚也难，那么为什么还要生女孩呢？是这些研究方法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目前社会政策中更深的东西，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从学术的深度和广

度（跨学科）上看，同学们戏言我“歪打正着”，当然也包括有很多机会。

问：进入妇女研究界后，你有什么特别深的感受？

答：因为妇女学学科对我们来说是新的学问，我本人说实在的也是一个晚入道的人，和80年代的前辈相比。我到这个研究所时，已经有很多专业研究者了，研究所至少三分之一的人都比我先来这个所。但是我想我的工作态度和最后的收获可能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年轻人是有了条件，才干这个工作的。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文革中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读书，当时我们大家几乎都有上山下乡、到工厂、参军的经验，那么我们把这些经验当成自己的财富和宝贝，非常投入地从这些经验中学习，让我们养成一种品质，不是具备了条件才去干某件事，而是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所以也使我们更珍惜各种历史机会，积极参与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研讨活动，这本身是一个马太效应，你参加得越多，你考虑问题的想法越不一样，你的财富资源越多，你的下一次机会越多；相反，你越犹豫，就越没有机会。因为你的态度决定了不断积累上的悬殊。这种执着和努力使我有较多的机会和经历。

问：能否介绍一下比较难忘的经历？

答：我是1993年9月底从部队转业的，两个月之后特别有幸参加了1993年11月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亚太妇女非政府论坛，这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区域性筹备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个论坛上，我记得有19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还有24个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非政府论坛委员会的代表，共43个中国大陆代表，那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在世界面前第一次亮相。当时的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启藻（实际应是王字旁，字库中没有）在会上宣布，说全国妇联是中国最大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在会上引起了震动，有人支持，有人质疑，我就是这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从菲律宾回来之后,我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非政府论坛委员会的工作¹, 出任论坛组织部副部长, 是较早的投入中国非政府论坛筹备工作的人之一。因为要筹备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大型会议, 所以我有机会参加一些重要的国际活动, 比如 94 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 参加了会议的非政府组织论坛, 95 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的非政府组织论坛, 这都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前联合国一系列的专门性大会。在参加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 我还有机会作为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观察员参加了政府级会议, 两边的活动使我比更多的中国参与者了解到联合国妇女问题决策的机制, 其实这是最重要的。

问: 你觉得参加这些活动对你的研究有什么样的作用?

这些活动使我的研究拓宽了眼界, 转变了观念,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举个简单的小例子。在参加 93 年亚太非政府妇女论坛之前, 我所受到的教育是邓小平同志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尊重科学, 不尊重知识, 打击知识分子, 所以改革开放之后, 小平同志把科技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也是把科技看成是非常正面的东西。到马尼拉后, 参加了一个“妇女和科技”的论坛, 听说科技还会对妇女带来负面影响, 我当时感到很吃惊, 和我接受的教育不一样。我们倾听人家的声音, 发现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会看到科技给妇女带来的另一面影响, 科技是双刃剑, 既可以造福人类, 推动妇女发展, 也可以把妇女拦在发展的门外。这些理念使我改变过去那种单一性的视角, 增添了新的视角, 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入地看待各种发展问题。

再比如, 我过去在研究工作中没有那种社会性别敏感, 对有些事司空见惯, 习以为常,

¹ 中国组委会有 5 个分委员会, 即大会委员会、行财委员会、宣传动员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和非政府论坛委员会。

不认为是一个社会问题。比如，反对对妇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马尼拉论坛上就有这样一个议题。马尼拉大会回来后，我们给非政府论坛委员会的领导汇报，请示我们是不是增加这个论坛。领导说可能不是很合适，领导的指导思想跟我们以前的指导思想一样，要展示中国妇女的伟大风采，中国人民的伟大进步。当时领导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家庭是五好文明，夫妻互爱，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打老婆（我们管家庭暴力叫打老婆），但那是前苏联，他们是酗酒文化（喝醉了以后打老婆），中国不是。”我们的第一次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随着筹备工作的深入（亚太区域论坛开完后，还有欧洲区、非洲区、北美区、西亚区的妇女非政府论坛），领导也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反对对妇女暴力”的论坛，于是非政府论坛委员会就责成中国女法官协会组织了“反对对妇女的暴力”论坛。

记得1995年3月8号在哥本哈根参加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时参加了会议举行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活动。每个人发了个小面具，是粉色的，我们都戴在头上，还有一首歌叫“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当时有的中国人不同意这个口号，说：“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妇女的素质那么低，看的世界对吗？应该用社会的眼睛看世界。”其实它是给人们一个视角，当我们用习惯的男性的眼光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忽视了世界上存在的那些歧视和不平等。于是要让我们增加这样一个视角，每个人戴上一个小眼镜，然后看世界上还有哪些事情是不平等的、不人道的、不人权的、不公正的，改造这些东西，使世界更美好。这样一个过程，使我的研究有了新的见解和新的推动。

问：依你的见解，在你看到的范围内，你觉得这给中国的妇女研究领域带来了哪些变化？

答：93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我从部队转到这个研究所工作，十一年过去了，不仅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环境都有了巨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不是可以用一两句话来说明的，举个例子吧。1994年人发大会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是写在人发大会上国际妇女运动反思人口政

策对妇女的双面影响。我在人发大会期间，参加了人发大会非政府论坛一个妇女的 Tribunal，我们叫模拟法庭，是系列活动，一共举行了十天，每天我都去听，回来以后写了一个包括非政府论坛的观点综述。在综述中，特别介绍了国际妇女运动反思一些国家的人口政策给妇女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有些国家人口发展的目标（无论是鼓励人口增长还是限制人口增长），都是通过控制妇女的身体来实现的，对妇女的身心造成伤害，这种伤害的形式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认为国家的政策肯定有利于人民。其实，我们国家那个时候也用了强迫命令的方法，不人道的方法，现在我们听起来可笑，就像我们听文革一样的可笑。许多人都见过，农村墙上贴着的大标语“宁添一座坟，不增一个人”；“上吊给绳，吃药给瓶”。似乎你要超生了，你就不应该活着了，对你怎样处分都不过分。有的地方组织了“国策队”（因为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让农村籍的复员军人参加。像老乡顺口溜说的，基层干部干什么，“栽草种树，拿大肚”，“催粮催产，刮宫引产”。让那些国策队的人三更半夜守在那些逃生妇女家周围，那些人白天不敢回来，一般深夜回家。只要看见家里的灯一亮，国策队就出动，把怀孕好几个月的妇女抓起来，弄到吉普车上拉走，到县医院去引产、结扎。那时我们觉得，国家的人口政策实现，就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否则治不住。我们看到的是女生孩子少了，有利于减轻家庭负担，参与社会的发展，确有这样的作用。但是我们仅仅看到这一面是不够的，国际人发大会强调人口发展要以人为本、提高妇女地位。这促进我们思考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更符合老百姓的利益，怎样以人为本，怎样关照他们的健康，不把他们当牲口而当作人看待。我就写了这样一篇综述性文章并给国家机关的女干部做了介绍。听说后来反映到上面去了，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责成国家计生委科技司司长找我谈话，让我不要这样说，要按照联合国和国家计生委的说法来宣传计划生育。我说我没有指责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以牺牲中国妇女健康为代价的，但是希望政府明白这些事情，认真改进工作。

全国妇联也很有意思，信访工作处接到过这方面的上访或告状，包括计划生育手术致残

的，但到此就为止了，不好处理了。但是现在进步了，国家制定了“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也限制了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行政权力，不可以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人家做结扎，计划生育手术必须经本人同意，妇女有对自己身体和生育的支配权力，我觉得真是个很大的进步。1995年以来，计生委改进工作，实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知情选择。他们还请我做了第五届、第六届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妇联就一个名额。他们还请教我：怎么用社会性别来分析优质服务政策？怎样以妇女为中心实行优质服务？怎么看待出生婴儿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怎么看待计划生育中的性别平等问题？我觉得，虽然他们的理解不像我们这么深，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人曾问我：你看到这么多的问题，对政府还有信心吗？我说：有信心！因为我实实在在看到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政府的进步和变化，政府的人口政策正在向以老百姓、以人为本的方面转变。我曾经说过，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对妇女来说相当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农民的意义。政府引进生育健康的概念，引进了优质服务，现在再引进社会性别概念，他们看到了如果不解决社会性别这个问题，那出生婴儿性别比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包括他们发起了“关爱女孩行动”，最近我还听说国家计生委宣教司想在民政部注册成立中国社会性别研究中心的消息。我觉得这应该是妇女组织的提议，但反过来是政府先提出。听到这些消息让我感动而且触动，那时候对社会性别一无所知，有时视如猛虎，当时找我谈话其实在警告我，现在让我出任了很多方面的社会性别或学术顾问，听取我们改进工作的意见，不一定你的意见都被采纳了，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和进步。

问：那就是说做妇女研究有很大的空间，与其他主流领域相比较，如果你涉及到一些正好和主流观点对抗的问题，你的做法是什么？

答：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中，包括学术政策，思想意识形态的管理，中国真的有自己的历史和特色。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民主国家，是党领导一切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

样背景之下，中国的女性主义也好，性别平等主义也好，也需有良知的、有理念、有智慧的学者，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政府和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确定自己的策略和运作的方式。学者们有很多的想法和建议，大家可能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结果也可能不一样。对我来说，我本人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副所长，是妇女研究的组织管理者之一，我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促进这些研究成果最大程度的转化。所以我尽可能利用现有的体制允许的机会和渠道，促进妇女研究成果在决策的时候发挥作用。在修改中国《婚姻法》的时候，我作为中国妇女研究会的代表，参加了这个过程。我们的建议不是所有的被采纳，但有的被采纳。虽然很多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是以前连这个过程都没有。

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使一些知识分子自发产生了群体的意识和主体意识，面对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他们有社会责任感和强烈愿望，希望组织起来参与决策。但我觉得作为一种机制、一种完整的理念，是第四次妇女大会出现的。我在1999年在牛津大学召开的“中国妇女组织研讨会”有一个发言，之后，我把它整理成一篇论文叫做“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那篇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趋势”中，我写了中国的妇女非政府组织要处理好的“三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是妇女非政府组织和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妇女和国家间的关系是近些年来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我认为，在我们国家这种体制内，要争取性别平等，必须运用国家的自上而下的这样一种机制，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机制。就像体育，中国体育的发展实际上是依靠举国体制的，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搞体育。中国要想获得妇女发展方面的进步，就得纳入政府工作的主流，这是国情。如果我们不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制订自己的策略，而是用生硬的批评或指责政府的态度，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是应该跟政府建立一个良好的伙伴关系，使我们的主张能够得到政府的理解、支持和促进。运用政府这样一种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推动妇女进步，比妇女组织孤军作战完全是自下而上活动更有效。当然，也不能忽视

妇女的群体力量。

第二个关系是要处理好妇女组织之间的，特别是全国妇联和其他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全国妇联是自上而下的一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它较少国际上妇女非政府组织的一些特性，比如独立性，比如与它所代表的那些妇女的亲密关系，比如它的平等和民主的机制。而且随着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这一代妇女领袖的淡出或者去世，新一代的妇女领袖还不具有这样一种非政府活动的经历，可能把这个组织办得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政府化，这种倾向也是可能存在的。此外，妇联也面临着社会的挑战，这次妇联提出的公务员同龄退休的建议，遭到了很多妇女的否定和指责，认为妇联只代表“贵族妇女”，这一方面反映了妇女利益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妇联脱离妇女在社会上不被认同的一个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妇联如何代表妇女的利益，如何独立自主开展工作，怎样定位，彻底改变搞运动、作秀、居高临下指挥和管理妇女的作风，是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现在政府的职能都在发生变化，强调把管理变成服务，妇联还没有相应的敏感，还在那里说我们要管理、要组织、要协调，居高临下的对待其他的妇女非政府组织，是不可以的。

第三个是妇女非政府组织内部的建设，即妇女领袖和妇女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建立自己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制，这也是很重要的。妇联组织有一个非常大的欠缺，是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但也是政府机制的复制，是官僚机构的复制，很讲究行政级别。当年黄启淦同志在怀柔的非政府论坛上，呼吁各个省的代表团，NGO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因为各省代表团中第一夫人、第二夫人或女高官们老在论资排辈，不想坐大客车，不想吃大锅饭（就是盒饭），老想搞特权，中国的等级制深入人心，包括被妇女们内化在自己的心中，她们不知道在一个非政府妇女组织中，要取得平等是应该打破等级观念。人们有不同的分工，而不应因此建立新的等级，她们不懂得这个要害的东西，不能真正同妇女们建立起真正平等和民主的关系。当我们改革非政府妇女组织建设的时候，我们是去复制一种论资排辈新的家长制和等级制

呢，还是用协商的、民主的、选举的、轮流的、分享的方式去建立这个组织，这是我提出的问题。我希望挑战家长制，发展新型民主关系，凡是按照老路子组织起来的组织绝对没有生命力。

此外，我觉得中国的妇女活动家能不能互相之间建立彼此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欣赏、互相担待这样一种默契的关系，建立在这样一种共同理想和价值观念下的姐妹情谊，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互相之间明争暗斗（开玩笑说是“中国特色”），妇女非政府组织是不能持续发展的。我当时在牛津提出的这“三个关系”，后来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认同。

问：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遗憾吗？

答：在这个过程中，有。举一个例子。我们开北京世妇会的时候，中国代表最多，5000多人，但是世妇会的机制是怎样的，说实在的，5000人中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后来我访问过一些参加过世妇会的中国妇女和男人，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政府的承诺和应履行的职责，更很少有人知道“社会性别主流化”（推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和12个战略目标，包括各级妇联干部。这是不可以埋怨大家的，而是我们自己的体制，使我们无法深入到那种决策和参与机制中去。

问：为什么？

答：我们一开妇女大会就习惯莺歌燕舞，我管它叫“歌德派”（歌功颂德派），我们喜欢展示风采，妇女们很在乎穿着打扮，像时装展览。我们不是在讨论某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怎么样把妇女的声音（包括中国妇女的声音）放到决策中去，做出一个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性别平等纳入主流的决策。其实非政府论坛是一个压力集团，是国际上一种民主决策的机

制。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认识到这点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在参与性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困难。

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派员参加国际论坛都是有限的，在名额资源不多的情况下，出国成为一种待遇或照顾，自上而下，论资排辈。这次你去，下次他去，或是工作可以离得开，又是领导或老同志，多年没有出国机会，而不一定是对这方面情况比较了解，有研究、有需求的人。开会回来就没事了，下次再换一拨人。因为你不了解情况，既不了解国外、也不了解国内的有关情况，你就插不上话，你越插不上话，你就越觉得自己边缘，听人家如数家珍，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还不如不参加，还不如上大街旅游购物。所以你会看到，一方面是中国少有参与国际活动的机会，另一方面是中国派去的为数不多的人逛大街，这是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筹备的时候，我戏言给中国妇女参加国际活动总结了三个特点：第一，溜边，第二，扎堆，第三，不发言。你看一个会议室，坐在门口、边上或最后的，肯定是中国人。为什么？抬腿好走，就不是以主体身份参与的。因为不了解情况，没有信心参与，有的也不感兴趣。第二是扎堆，中国人出去开会或在国内参加国际会议，不是抓紧时间机会与外国人交流，而是与中国人扎堆。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文化啊，语言啊，交流方式啊，还有参与程度，人家都是圈子里的老熟人，你是生人，怎么跟人家打招呼？第三个是不发言，因为你插不上嘴，不知道别人在讨论什么事。

在这种边缘的情况下，就出现这种怪现象：一方面参加的机会很少，另一方面有了机会又无法珍惜。这次（03年12月19-21日）在香港召开的第五次东亚妇女论坛又是这样。东亚妇女论坛建立于1993年马尼拉亚太妇女非政府论坛，它东亚妇女非政府组织一个交流、对话、磋商、决策的机制。中国代表从各种渠道去了不少，来自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地区或城市，由不同的国际基金会或单位支持，加起来有四五十人，除了香港当地的代表，人数可

能是最多的。但真正参加会议、坚持到最后磋商完《宣言》和《工作议程》的，可能不过十
三四个人，其他人都上街了。一方面没有参与机会，另一方面又不能充分参与。

顾秀莲同志曾经对我说：“伯红，你们经常出去，得想个办法啊，国际上妇女运动、妇
女理论这么多流派，但没有咱们中国的。你们得发挥作用，把我们的声音打出去，建立中国
的流派。”不管顾主席的要求出于什么目的，但我想如果我们这样参与，恐怕永远没有我们
的声音。

再就是我们参与的目的。我们总想“展示”中国的“风采”，好像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做得挺好，比你们强。发言喜欢讲一大堆成绩，然后轻描淡写地说点不足，提出点建议，
全是空洞的，没法操作的，还喜欢用很多别人不懂的词。其实你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别人少，
你的家庭暴力也不是一个小数，只不过你不愿正视罢了。

问：面对这种情况，你觉得自己在其中有什么责任吗？

答：我觉得自己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把这种机制介绍进来，并推动中国妇女加入到这个
机制中。我们怎么把存在的社会性别问题深入分析，实事求是提出我们认为的解决这些问题
制度性的、法律性的、政策性的、主流化的结论和建议，一方面将其纳入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宏观规划中，另一方面纳入到各种各样的国际发展条约中，改变社会发展状况和女人男
人的生活，这才是妇女运动的实质。

对于我来说，我的一个任务是推动这样一种变化的进程。比如，世妇会后我一直参加了
中国的“北京+5”的活动（即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五周年的活动），现在我们正在启动“北
京+10”的活动（即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周年活动），使我们的妇女研究、社会性别研究
改变“歌功颂德”的作法，以研究推动社会性别问题主流化。我不是说不能“歌功颂德”，
我们应该总结好的实践和经验，作为中国的贡献请大家分享。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去想办法解

决存在的问题，找出对策，把法律、政策、机制一步步发展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还有我们应该摆脱就事论事的作法，我们比较习惯于只干一件事，不习惯看这个背后带来的制度性的变化。我们去参加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论坛，我们只关心人家有什么好作法，但是不关心妇女运动的整个进程和决策机制，如果我们不把“反家暴”写进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中去，不写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去，不写入《北京行动纲领》中去，反家暴的影响和力度也是有限的。反家暴不是一个孤立的、具体的做法问题，解决它的机制、制度、过程、影响力可能是更实质、更重要的。

问：你的意思是说加入那个过程和机制更重要，对此，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和资源吗？

答：我的工作岗位可能使我有的一些机会和渠道。我是这个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之一，作为专家我对一些部门领导人的建议可能有一定影响力。如果按照 1949 年计算的话，全国妇联建立 50 多年了。这 50 多年中，为什么国际妇女运动 70 年代、80 年代就逐渐创立了社会性别概念，它一直不知道，直到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开了以后，才慢慢知道。原因之一是全国妇联的国际交往活动服从于中国的外交，是在中国外交的总体框架下开展，夫人、女儿、公主的外交活动，没有根据妇女发展的需要独立自主地开展妇女活动，广泛地深入到国际妇女运动和联合国推进妇女发展的进程中去。那么现在是否可能作为专家，开启一扇门，提醒全国妇联和有关政府部门改进这方面的问题。作为专家，在一定程度和环境条件下，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我可以在我的研究和教学中，不断倡导这些理念，使大家知道其实这种机制和体制比了解一个具体问题的结论还重要，实际上也是在推进中国政治民主的建设。80 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满腔热情地投身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学习和研究中去，可惜后来中断了。现在也许可以通过性别平等主流化来实现这样的理想，所以，对我来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幸运的是，我的工作岗位使我有较多的机会和资源。

问：你是否认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妇女研究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答：我认为是这样。80年代以后，中国的妇女研究一直在成长、发展，有不同的发展阶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我写过一篇文章谈世妇会对中国妇女研究的影响，认为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妇女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不管是主要议题、还是理论框架、还是研究方法、还是和妇女运动的互动机制，都使中国的妇女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当然不可以估计的无限高。同时也可以看到，社会性别这样一个视角或者说分析方法，毕竟不是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冲突和融合也需要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在国际劳工组织机制中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项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把“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七个字，翻译成大家都认同的、符合原意的中国词。我们干了一年半了，还没有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词。曾有人建议是否相当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大家还觉得两者不是一回事；有的说“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大家还觉得不是一回事。实际上这也说明一种文化传统与国际理念融合的过程，是个非常巨大的挑战。王政的文章里也曾经说过，国内不少人运用“性别意识”这个词，用意可能截然相反，有的用于推进性别平等观念，打破传统性别角色定型；有的用意是要建构或强调传统性别角色，让女人更像女人，男人更像男人，两种用法截然相反。

在我们的文化中，实际上人们对性别意识的理解是非常复杂的，人们的社会生存环境是非常多元的。所以我觉得妇女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我们不可以要求在所有的方面一下子达到倡导者们理想的那种水平，但是我们要推动向这方面的努力，这是非常难的。你既要尊重大家的理解力，也要不断地探讨其中的联系和区别，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就是我所做的工作。包括在我的课题中，我们怎样看社会性别平等和社会性别公正，以及这些概念和我们认为的“男女平等”的联系与区别。实际上我们认为的“男女平等”在

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现在国际上对性别平等理念的要求，两者不是建立在相同基础、标准和体制制度上的。那么怎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发展起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带有未来的前瞻性的，相对来说合理的理念，我认为这个路还特别长。

问：你现在做的课题，是不是正在朝这个方向走？

答：是这样的。我们把国际劳工组织的课题叫“3 + 1”课题；“3”指的是劳工组织的三方机制，在中国是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1”是全国妇联。我们给自己的课题定了一个位，希望通过课题，能把我们对妇女发展的认识，从WID（妇女参与发展）提高到GAD（性别与发展）。我们的政府，也包括妇联，要解决眼前的、实际出现的妇女（问题），但不注重改变社会性别结构和制度。比如说妇联提出的“五好家庭文明建设”、“双学双比”、“巾帼建功”等，包括维权，多是在不改变社会性别关系和结构的情况下做的。还有促进下岗妇女再就业，让她们去做社区服务，让她们从事非正规就业、在就业结构中最低的那一部分工作，只要完成政府的再就业目标就可以了，帮助妇女找到工作就可以了。我们并不去考虑她们的社会保障问题、职业发展问题、就业结构下降的问题、“男主外女主内”的结构问题。这种思路还是把妇女加到社会发展中去，把妇女当成发展的客体，当成实现某一政府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目标的手段。我们怎样转变成以人为本，包括以妇女为本的发展观，使妇女成为发展的主体，在推动妇女再就业的同时改变社会性别结构，改变制度和体制，改变不合理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关系，使我们对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我们项目对妇女发展方面的一种考虑。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文化、教育、包括一些制度改革还达不到这个层面，一下子达到GAD这个水平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既然人类已经发展到GAD这个阶段，我们应该站在GAD的高度上去考虑WID的问题，不能总是就事论事。这是我们项目的一个理想，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我们没有把握，但

在努力，包括我们怎么去说服妇联的领导人，三方机制的领导人。我们不断地被人请去讲课，讲课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这些新的研究：对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政策完善和改变、纳入主流等告诉人们。这样做真的非常累，有时候我开玩笑说：“这是荒了自己的地，耕了别人的田”，所有自己的项目都做不完，但要天天往外跑，给别人讲课，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

问：你们课题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答：在这十年的研究中，我们一直在探讨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我们对性别平等理念的接受或执行。后来发现，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男女平等的文化传统，既是理解性别平等、社会主流化的基础，也有相应的障碍。我们的项目探讨了社会性别主流化和人们认为的男女平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我们做了调查，包括问卷调查、焦点组访谈、个人访谈、研讨会，对象包括“3 + 1”部门工作人员，男女官员等。结果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大家习惯把社会性别问题看成是妇女问题，解决妇女问题由妇女组织来做，由于妇联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所以把社会性别问题妇女化了，妇女问题边缘化了。

我们认为，第一个层面，社会性别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是两性的问题，而不仅是妇女问题，一个单一性别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到，所有的妇女问题几乎都和男性有关，比如说拐卖妇女，一般来说男的是拐人的，女的是被拐的；比如所谓的嫖娼卖淫，没有嫖客哪来的妓女；比如说妇女参政，所有的女干部几乎都是男干部任命的，是一个男性权力和社会结构问题。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仅仅把它看作妇女问题，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这是性质的问题。

第二个层面，通过什么去解决。我们认为一定要放在主流，一定要政府和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承诺，政府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去做，融入到所有政策中，这才叫主流化。而不是政府挖出一些钱来给妇联，由妇联去实现。就目前中国妇女组织的地位而言，让妇联去做，

带来的就是边缘化的结果，这是途径问题。当然，我们强调主流化的同时，也不能否定“双头战略”，即不能否定专门针对妇女的项目和对妇女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两码事。

第三个我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国际上性别平等和中国的男女平等的标准问题。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很多人把“男主外，女主内”当成男女平等，有的以男性为标准，就是“老人家”的名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是以男同志为标准，而且这个男同志也不是破除传统性别角色、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的男同志，实践的结果导致了不顾生理特征的“男女等同”。我们的文化深处，不一定把女性平等地包括在“人”中，这种现象是普遍的、自上而下的，比如我们某些领导讲话，说：“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警惕金钱、权力、美女的腐蚀。”这里讲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女干部了吗？河北省石家庄市妇联的同志告诉我，连妇联的文件都这样说。我们请领导人填写有关平等的调查问卷，看他/她们的平等观。对“城里人有城里人的平等，农村人有农村人的平等，农村人的平等和城里人的平等不应该一样”这样的问题，很多干部表示赞成，因为城乡发展水平不同，就把平等变成了有等级标准的平等了。对“让男人做适合男人的工作，让女人做适合女人的工作，男女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的说法，很多人都同意，但什么“适合”男人的工作，什么叫“适合”女人的工作，还是停留在“男人适合当领导，女人适合当秘书”的阶段。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和现存的城乡差距就把“不同等级的平等”合法化了，这就是一些共产党人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显然落后，但我们不以为然。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国际组织都有自己的对“平等”的定义，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比如国际劳工组织对平等的定义，性别平等是指男女在权利、责任、机会、资源、评价和收益方面的平等，使男人和女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不因为生理上是男人或女人而受到各种限制，这叫性别平等。咱们不好好研究，坐下来就侃，既败坏了研究的风气，又不能推动问题的解决。

第四个我觉得国际上的性别平等和我们的男女平等建立的基础不一样。国际上的性别平

等是建立在基本人权的框架之下的，比如获得体面的工作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政府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机会和服务；再比如生育权也是基本人权框架下人的权利，包括生女孩也是基本人权，不应该用法律固定生女孩没有价值。但是我们的男女平等权利，还建立在政府为老百姓做主的基础上，我给你什么权利，你就有什么权利，比如说男女公务员不同年龄退休。社会性别主流化促进我们树立进步的全面的人权观。

第五个问题就是社会性别分析和传统的妇女分析方法不一样。我不想展开说了，因为不同的分析方法，结论太不一样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基本上就是一个莺歌燕舞的调查。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调查没有包括最不平等和最敏感的两个妇女群体，我们只覆盖了18 - 64岁的妇女，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全世界最突出的问题，女孩不可以出生；还有老人（女老人）的贫困化问题，两头都不做，避开了中国妇女地位中最敏感的问题。调查还受到一种思维方式的限制，这种思维方式是，“如果中国妇女的地位没有提高的话，我们妇联的工作不就白做了？”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谈问题？“如果没有妇联的工作，妇女的地位可能更低”。社会性别分析是什么，是分析两性存在的差距和原因，用改变制度和政策的办法，使之逐步减少差距，逐步实现两性平等。

第六个方面，妇女和男子是否是发展的主体。男女两性在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能否参加发展决策，在决策中能否发出声音，通过发展能否增强权利、提高能力，建设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取得男女“双赢”的结果。

第七是在看待发展问题的前提下，经济发展不能自然而然地取代性别平等。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妇女发展的前提条件。但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了妇女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有的甚至以牺牲妇女的发展为前提，既是不公正的，又是不可持续的。

第八点是至关重要的，是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不一样。传统的看法被概括成老五条，一是阶级，二是私有制，三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四是传统观念影响，五是妇女素质低，

五个方面，没有突破。社会性别主流化主张对社会性别结构、社会性别分工进行分析，同时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阶级、种族，国家、市场、社区、家庭等因素，丰富和推动了对社会性别问题复杂性的理解。

我们的研究发现，社会性别主流化和社会性别平等对中国传统的“男女平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内有个时尚语言“与时俱进”，在男女平等理论的发展上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学习国际社会成功的经验和理念，提高国内社会发展和妇女运动的水平。而不能只唱高调，搞运动，人家真的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调门越来越高，圈子越来越小，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社会支持越来越少，威信越来越低。

问：你怎样看待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从而推动这方面的变化？

答：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毛病，我们叫“伟大的自卑”。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闻名古国，有一种强烈民族自尊心和优越感，当国际上出现一种东西不是它提出来、发明的時候，它老怕自己落后，于是老有一种心态说自己什么都有、什么都行。国际上一提性别平等，就说我们有“男女平等”；一提主流化，就说我们有“基本国策”；一提可持续发展，就说我们有“两手抓”，等等。举个例子，前两天我接待加拿大的一个项目设计专家（女）。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打算支持中国最高法院在法律系统中推进性别平等，她和高法有关部门的人说这事，都是男同胞。她说出目的后大家直笑。她问翻译，他们笑什么。翻译说，要说男女平等这事，应该是中国给外国介绍经验，轮不着加拿大帮助中国。这些中国官员根本不了解加拿大性别平等的情况，就觉得中国做得特别好，就是我说的那种“伟大的自卑”。

尽管中国妇女地位在联合国的排序中老往下降，但是中国干部中认为中国妇女地位特别高的人不在少数。这种“伟大的自卑”老想自己其实什么都好，不愿向别人学习。国际上把很多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指标都确定了，你还在那以经济（GDP）为中心。现在党中央和政

府开始讲科学发展观，才把以人为中心放进去，但在认识上离真正的科学发展观还远着呢！

最起码政治民主这一条就够几代人干的。要真正实现科学发展观还有漫长的道路，但我觉得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推动这个进程的一个切入点。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社会实践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世界观、价值观问题。